

近现代国学资料丛书

主 编 | 纪宝成

执行主编 | 黄朴民 梁 涛

国学与民族国家

于春松 陈壁生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地址：臺北市中正區

電話：(02) 2311-2311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圖書分類

100

本书获华民慈善基金支持

国学与民族国家

于春松
陈壁生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学与民族国家/干春松,陈壁生编.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3

(近现代国学资料丛书)

ISBN 978-7-5495-0166-3

I. ①国… II. ①干… ②陈… III. ①国学-研究 ②
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中国 IV. ①Z126 ②D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15261号

出品人:郑纳新

组稿:郑纳新

责任编辑:张玉琴

装帧设计:赵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31260822-129/139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960mm×690mm 1/16

印张:20.5 字数:370千字

2011年3月第1版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56.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本书获华民慈善基金支持

《近现代国学资料丛书》编委会

主 编

纪宝成

执行主编

黄朴民 梁 涛

学术顾问(按姓氏笔画排列)

方立天 冯其庸 庞 朴 张岂之 张立文 李学勤 傅璇琮

编委会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卜宪群	干春松	马克锋	王子今	王炳华	乌云毕力格
纪宝成	孙家洲	刘笑敢	吴 光	陈 来	陈启云
杨庆中	沈卫荣	孟宪实	徐 飞	袁济喜	梁 涛
黄朴民	黄克剑	诸葛忆兵			

总 序

纪宝成

—

本世纪初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成立所引发的“国学热”，既是一场民族文化的复兴运动，也是对现行教育体制的改革和完善，国学既是“国魂之学”也是“学科之学”。

对于何为国学，学术界有不同看法，归纳起来大致有三，一是认为国学是我国固有之学术。这主要是就国学的內容而言，认为国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这是最常见的看法。二是认为国学并不完全等于传统学术，而是近代学者受西学的刺激，借鉴西方的研究方法，对传统学术的研究、整理，它强调的是世界眼光、现代意识。三是认为国学是“国魂之学”，是一个国家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的基础，强调的是国学的价值和意义，它与古代“欲亡其国，先亡其史”的说法在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在我们看来，这三种理解都有一定的合理性，是可以相互补充的。国学研究总是要以以往的历史为对象，离开了传统学术，国学研究就成了“无米之炊”，国学也就不成其为学了。但我们今天研究国学，不是对传统国学的简单回归与重复，而是以现代的理念为指导，充满明确的创新意识和与时俱进的当代精神，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传统思想与学术的一种“重构”。从知识上来说，今天的国学应该是更有体系、更有条理，更符合现代学科的要求。同时它又是“国魂”之学，应承担起民族文化重建的使命。

近百年来，由于中华民族遭受到一系列屈辱与挫折，国学的地位遭贬低，国学的价值遭否定，国学的意义遭质疑，国学的未来遭抹黑，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国学几乎成为落后、愚昧的代名词，必须由它来为中国近代以来的衰落与灾难承担总责任。这种以激烈批孔、否定传统文化为中心内容的思潮的兴起不是偶然的。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它是不少知识分子极度忧患民族命运、国家前途的积愤之言，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合理性，因为国学中的确包含有已经不合时宜的思想意识，如极端维护专制的理念、束缚人心与人性的三纲伦理等。然而，真理越过一步即成为谬误，如果因为国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而对它加以一概抹杀，全盘否定，显然偏激而片面，是

把洗澡水与孩子一起倒掉,并不可取。导致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非常复杂,我们决不能简单地把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归结为中国传统文化。相反,几千年连续不断、一脉相承的中华文明及其价值体系,如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吃苦耐劳的优良作风等,在战胜外来列强,赢得民族解放,以及中华民族的腾飞和崛起中发挥了积极的、无可比拟的作用。一个人没有灵魂,只能是行尸走肉;一个国家没有魂魄,也不可能长治久安。如果说,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国人主要是对传统文化进行“破”的话,我们今天则是要在这样的状态下着眼于“立”,继承传统国学的优秀、活的传统,同时吸收西方近代以来科学、民主的先进思想,重塑“国魂”,再造中华文化的当代思想体系。“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国学”是文化之根,是民族之魂。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决不能成为无根的民族,而应当在历史的亘续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多元文化的激荡中确定自己的地位,在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迈出自己坚定的步伐。

我们视国学之为“国魂之学”,是因为国学本质上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载体,是我们的精神家园、精神故乡,我们的安身立命之地,是中华民族的精神长城,是我们伟大民族顶天立地的思想根基、力量根基,也是我们不可战胜的强大自信心的精神源泉。只有国学才可以更好地反映不断变化的“中国形象”,清楚说明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告诉世界“中国人”是什么样的人。只有国学才能客观地描述中国思想、文明和精神的真实状况,说明影响和决定国人行为的内在体系,以及它如何有效支持国家“硬件”的运行。为什么目前社会上是“国学热”,而不是其他学科的“热”?这最好不过地说明,国学适应了时代的需要、社会的需要、人民的需要。重振国学是顺乎天,应乎时,合乎民。当我们一些学者纸上谈兵,喋喋不休地质疑国学的合理性时,广大群众却早已回归国学、接受国学、热爱上国学,因为国学就是他们的精神信仰、生活方式、处事原则,他们需要国学,离不开国学。我们相信,随着国学研究和普及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会接受国学,国学会更好地发挥塑造民族之“魂”、“建设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的积极作用。

“国魂之学”意义上的国学可以是广义的,主要表明了一种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立场,凡是从事传统文化研究,包括文史哲的学者,只要是对传统持同情的理解,抱有弘扬的态度,都可归于国学的旗帜之下。从这一点讲,国学不同于一般的传统文化研究,传统文化研究可以是“价值中立”的,甚至是纯然批判的态度,或者是纯粹整理国故的心态。而国学研究则首先需要一种自觉的担当精神,一种强烈的弘道意识。从事国学的人虽然也对传统文化的糟粕部分进行批判,但其最终的目的却是为了“返本开新”、“推陈出新”,是为了弘扬、重建中华文化。因此,国学的提出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意义重大。它既是对党中央关于弘扬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精神的响应,也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国学的需要,同时还在广大人文学者中形成一股凝聚力,树立起一面旗帜,将大家统一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来。

二

国学不仅是“国魂之学”，同时也是学科之学。作为“国魂之学”，国学可以是广义的，具有旗帜、统合的作用；而作为学科之学，国学又是具体的，有明确的研究对象、范围、内涵和课程设计，处理好与其他人文学科尤其是文史哲的关系，是国学健康发展的关键。

国学本是个世纪初一些学者为保存我国固有学术的一种努力和尝试，但面对西学的强势地位，上个世纪二三十年成立的国学研究机构，如北大国学门、清华国学研究院、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等，又纷纷接受、采用了西方分科的方法对我国固有的学术、文化进行分类，一般分为文、史、哲，加上语言、文字、民俗、考古等。这样国学就成为一个过渡阶段，逐渐让位给以文、史、哲为代表的现代学科。不可否认，当时人们采用西方学科体制对国学进行分类有其合理性，文、史、哲等学科在传承古代文化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实践，我们有必要回过头对文、史、哲的现代学科进行反思，检讨其中的问题和弊端。如学者指出的，中国传统学术是整体之学、博雅之学、汇通之学，强调知行合一，经世致用，注重义理、考据、辞章的统一，将其放在“西学”的学科门类之下，必然是削足适履，摆脱不了肢解“国学”之弊。例如，经学是中国文化之根，规定了华夏文明的大本大源，塑造了华夏族群两千多年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生活，塑造了我们祖先共同的生活方式。但在文、史、哲的学科体制下，《诗经》变成文学，只能探讨《诗经》中的艺术特色，考证《诗经》中的鸟兽虫鱼，而三家诗、毛诗所体现的诗教精神，三百篇之所以成为“经”的精神，则基本上被排除在外。更让人感到遗憾的是，《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仪礼》这些经典完全被排除在现代学科视野之外。而恰恰是这些经书，在历史上曾经对政治的改革、制度的建构、生活方式的变化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但由于它们和现代学科基本上没有重合之处，以至于长期得不到研究，这不得不使人发出“数典忘祖”之叹了。还有，子学是中国文化的瑰宝，是古代诸子对社会人生的见解与思考，包含了哲学、政治、伦理、教育、科技等丰富的内容。与经学不同，子学不是对经书的诠释、解读，而是通过个人对社会人生的观察、体验，提出系统的思想主张、见解及社会改革的方案，故子学是传统文化中最富有创造力，内涵最为丰富，也最具有个性魅力的部分。但在目前的教育中，子学被分割到文史哲不同学科之中，文学系将《论》《孟》《老》《庄》当文学作品看待，探讨其艺术风格、文体演变；哲学系则将其看做儒、道的哲学经典，研究儒家、道家的思想发展；历史系则将其当史料看待，钩沉其中的人物、事件，结果只能是得其一偏，难窥其整体之美，完整的子学被活活肢解。

其实，以西方的学科分类为标准，把西方看成是现代学科的典范，我们目前的学科分类仍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西方除了文、史、哲的学科外，还设有古典学，对古代希腊、罗马文化做整体、综合的研究。这说明，中西古代文化具有相似性，它们都亦文亦

史亦哲,都具有圆融、整全的特点,不可做简单的分科研究,有必要建立专门的学科,采取综合式的研究,才能真正深入其堂奥。国学学科的地位和作用,与西方古典学相似,都是对文、史、哲分科的一种补充,是对我国固有学术中那些不能简单地分割到文、史、哲学学科中的内容,如经学、子学等,一种整全的研究。

现代教育有一个综合、交叉的趋势,我们不否认文、史、哲分科的合理性,但在这个基础上还应有新的综合,国学学科的设立,就可以起到这样一个综合的作用。人们常说“文、史、哲不分家”,其实文、史、哲本来就是现代学科分化过程的产物,不存在分家不分家的问题。大家之所以这样讲,意在重申其源头本来是一个整体,应该有综合。但分科既已形成,想要综合已非易事,故海内外许多高校都设立高等人文研究院之类的机构,目的就是为文、史、哲等学科的综合、交流提供一个平台。我们认为,设立国学学科,成立国学院,可以更好地促进学科的融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设有国史、国文等专业,但它与历史系、文学系中的中国历史、中国文学专业并不完全相同,我们更强调经史、文史的会通,打破学科的壁垒,真正继承古代学术的优良传统。所以国学学科一是可以弥补文、史、哲的不足,避免对传统学术的肢解、割裂之弊,二是可以促进文、史、哲的沟通与融合,使其真正做到“不分家”。

总而言之,文、史、哲等学科贡献很大,必须肯定;现行的学科体制存在弊端和不足,有必要改革、完善。而设立国学学科,正是改革、完善现有学科体制的一项重要举措。

三

从清末民初到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到今天,国学的发展经过了几次高潮,其间的起起伏伏,值得人们总结和深思。我们将几次国学运动中的文献进行搜集、整理,分为现代学术、民族国家、经学、子学、国文以及焦点争鸣等题目,编写这套“近现代国学资料丛书”。这套丛书虽然只是资料的性质,但同时也包含了编者对国学发展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深沉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建立就曾学习、借鉴以往国学机构的经验,国学先行者的实践是我们一份宝贵的财富,继承并超越前人乃是我们的目标。

最后,我要对那些长期以来一直关心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发展,并给予热情帮助的朋友表示深深的感谢!并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国学,支持国学,使国学事业兴旺发达,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添砖加瓦,为中华学术的繁荣发展添色增光。

二〇一〇年九月十五日

国学：国家认同与学科反思

千春松

“国学”在中国古代是指设在京师的教育管理机构和高等学府，而近代以来为学人们所关注的“国学”则主要是指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和价值体系。其概念和最初的内涵来自日本的国粹运动，目的是要处理在西方思想文化和生产方式的冲击下，“本国”思想文化和价值体系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很显然，“国学”这个词的引入带有弱势文化的防御性特点。

从国学思潮的发展历史来看，自晚清国粹派、章太炎到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整理国故”运动，一直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国学热”，不同的阶段对于“国学”的意义和内涵的理解差异巨大。在见仁见智的各类见解纷争中，国学“运动”和国学研究贯穿着两条基本的线索，其一是国家意识的确立和民族精神的重建；其二是对近代以来所逐渐形成的研究传统文化的学术（科）体系的接受和反思。

本文将以此为脉络来梳理“国学”所蕴涵的复杂的理论和思想文化问题，并分析当下“国学热”出现的内在原因和可能的发展方向。

一、“国学”与国家认同的迁移

所谓“国学”，其最重要的立足点在于“国”，也就是与别的国家相对待的“本国”，这在当下已属无可赘述之常识，而在海禁初开的19世纪后期，乃是一问题的焦点。原因在于当时的国人并无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

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①体系是在罗马帝国解体后在西欧形成，并随着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断确立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格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基本社会生产方式和组织理念的变化，形成了以国家间的劳动分工为特征的经济体系。资本的逐利驱动推动了西欧国家在全球范围的殖民

^① 国家广义地说可以指一切治权独立的政治共同体，但本文一般指的是民族国家，它意含治权独立的政制性格和民族统一的文化意味。而民族的含义主要是“国族”。参见江宜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台北：扬智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8年，第6页。

活动,将民族国家体系扩张到世界各地,它冲击了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上的传统政治体系,中国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拖入民族国家的建构进程中。

“中国”之名由来已久,但是,一直以来并不是“国家”的名称,“中国”不仅标志着地理上的世界中心,还意味着文明和教化的先进。而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是以“宗主国对藩邦”为基本架构和以“怀柔对朝贡”为机能的世界体系和秩序。^①虽然,中国作为一个王朝国家一直以具体的朝代作为国家的名称,但是,“中国”一直是我们的共同的价值认同。

然而,秉承这样的观念的清王朝却必须面对一个全新的挑战,即西方世界新形成的民族国家体系对于清帝国的宗藩体系的冲击,不仅如此,由于军事竞争的失败,曾经自以为是天下共主的中华帝国突然发现,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之后所形成的“治外法权”和租界等损害国家主权的局面下,中国的独立性被局部剥夺。所以在优胜劣汰的进化观念的刺激下,建立民族国家成为争取经济自由和文化独立的重要手段。这样,建立在宗法基础上的政治法律体系和以文化价值为基础的天下国家观念,逐步为追求独立的民族国家的理想所取代。这样的变化说明了中国已经不能仅仅通过易服色改正朔这样的传统手段,在内部关系的调整中确立权力的合法性,而是必须通过厘定外部世界的主权关系,来界定自己的合法性。

由此,国家意识的强调既符合社会进化的公理,也是抵御外敌的思想资源。杨度认为在强权的时代,须以国家思想才能抵抗外国的侵袭,因此主张抛弃天下主义和家族主义,提倡国家主义。^②梁启超认为天下一统的观念虽然是崇高的道德,但并不切合中国的实际,在当下,国家才是忠诚的最高点。^③由天下观念向“国家”意识的转变是近代中国人对于世界秩序认识的重大转变,这样的转变在近代国学的最初倡导者章太炎和国粹派那里有十分明确的表达。

在章太炎看来,对于国家的确认并不具有什么崇高的意义,而是在一个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世界格局中,国家成为一个“不得不然”的存在。他说:“今之建国,由他国之外铄我耳;他国一日不散,则吾国不得不牵帅以自存。”^④在这样的背景下,确立国家意识,构建国家认同成为“国学”的使命。

一般来说,国家认同是一个含有多重意义的体系,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即“族群血缘关系”、“历史文化传统”与“政治社会经济体制”,即所谓的“族群认同”、“文化认

① 参见王中江:《近代中国思维方式演变的趋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71页。

② 杨度:《金铁主义说》、《论国家主义与家族主义的区别》,刘晴波主编:《杨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13—397,529—533页。

③ 梁启超:《新民说》,李华兴等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18页。

④ 章太炎:《国家论》,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集》上卷,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68页。

同”与“制度认同”。^① 在经历大变局的近代学者那里，他们所建立国家认同的资源也因政治和文化立场的差异，各有不同。比如以孙中山等为代表的革命派主要强调族群和血缘关系，试图通过民族革命来推翻清朝的政治社会经济体制。康有为则偏向于制度认同，主张改良。但是，更多的情况是这三方面的资源兼取，因为国家建构的过程，并不是对于传统的政治、文化和历史的简单回忆，而是一个重构的过程，也就是通过对于历史的重新理解和整理来凸显民族历史中积极的和符合当下形势的部分。

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意识的重构过程，也就是近代国学的建立过程。晚清国粹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邓实说：“国学者何？一国所自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②这段文字十分强调“学”之产生和应用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与中国传统学术以天下为指向的普遍主义的态度已大不相同。他们进一步认定国学之存在是国家存在的基础：“国有学，则虽亡而复兴，国无学，则一亡而永亡。何者，盖国有学则国亡而学不亡，学不亡则国犹可再造，国无学则国亡而学亡，学亡而国之亡遂终古矣。”^③

“国粹”一词虽由日本传入，但对于“粹”的强调明确表征出选择、重构传统资源的意图。国粹派的一个重要论题就是区分“国学”和“君学”，他们认为不以学术之真伪为标准，而以功名利禄作为指向的学问是“君学”而不是国学，他们批评“君学”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认为“君学”是人们只知道有朝代和帝王，而不知道有国家。他们指出孔子的思想，到汉代已经与君权结为一体，所以，一方面由政治专制而达成学术专制，制约别的学派的思想发展，同时也使儒学自身趋向僵化。所以，国粹派的精神领袖章太炎说：“为甚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是就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④其目的是要反对欧化主义者，认为中国百事不如人的心理，要“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国粹派经常使用“国魂”的说法，强调要融汇中西，重铸国魂。

如前所述，近代中国“国家”意识确立的原因主要并不来自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而是来自西方政治和军事的侵袭，也正因为如此，国家认同所要面对的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对待西方的政教体系和文化价值的问题。

伴随着工业社会和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发展而形成的民族国家体系，在其形成之时，就存在着以欧美为中心和以其他地区为边缘的差序格局。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依靠军事和行政组织能力，通过不断扩张的方式来推进其市场的逻辑，这样就把中国这样

① 江宜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1998年，第15页。

② 邓实：《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1906年第19期。

③ 许守微：《论国粹无阻于欧化》，《国粹学报》1905年第7期。

④ 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集》上卷，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76页。

的处于市场边缘的国家置于两难的困境。一方面,以寻求国家独立为目的的追求富强的冲动,需要我们接受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和市场为导向的机制来适应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因为依靠传统的方式已经难以维持国家的主权和保持竞争力;另一方面,要通过承续传统的符号体系来激发国民的凝聚力和创造力。更为深层的问题在于,这时的东西文化之争,并不完全是一个文化认同的问题,而是一种以世界市场为基础的新的生产方式对于农耕社会的挑战,也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社会组织方式对于以血缘和家族制度基础上的中国社会的挑战。

所以从国粹派开始的国学研究者,一直在申辩提倡国学并不是要阻碍“欧化”。国粹派提出文化发展需要中西互通,他们所要反对的是两种极端的倾向,一是“醉心欧化”,认为中国万事不如人;另一种就是“盲信己国”,依然以夷夏的观念来看待外国。而国粹派所提倡的是以中国为本位的兼收并取的态度。

在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正式成立,并颁布了新的法律体系。不过,模仿西方政体而建立新体制并没有带来预想中的社会繁荣,反而是在新的市场机制下乡村社会的破产和在新旧转移过程中国民道德的崩溃。面对这样的社会现状,一部分人将道德的崩溃视为制度变革的失误,试图通过提倡传统价值来重建社会道德系统。而在以陈独秀和胡适等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提倡者看来,现代中国落后的根源在于传统中国建立在专制和迷信基础上的文化观念,而观念的落后的基础则是以自然经济为主要特征的传统的生产方式,因此面对新的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发展阶段,以儒家为代表的思想文化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阻碍性力量。很显然民国初年袁世凯和张勋等政治人物假借通过传统文化来装点他们的政治行为和康有为、严复等人对于新的共和政体的批评,都导向了启蒙运动以一种激烈的反传统的方式来展开。

而吊诡的是,1920年代以后,一向以反传统形态出现的新文化运动出现分化,一部分人转入“整理国故”,并将之纳入新思潮,引发了新文化运动内部的质疑。

“国故”这个词本是章太炎对于传统中国学术的称呼,用以取代“国粹”这个带有价值评判色彩的名称,但是章太炎的立场是明确的,中国的精神存在于中国的历史和典章制度中。而启蒙思想的倡导者毛子水、胡适和傅斯年等人在沿用“国故”这个词的时候,则是试图通过整理国故的过程,来宣扬“科学”精神,批评一部分人对于国故的追慕心态,从而“再造文明”。

胡适给“国故”下了这样的定义:“中国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国学’。”^①胡适在这篇文章中认为,国故这个名称最为妥当,因为其中立,不含褒贬,所以他不愿意用国粹之类的词。在这篇文章中,胡适特别强调国学的研究方法,所以他反对康有为将儒家孔教化

^① 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7页。

的做法,也并不认为古文古诗的保存就是国学,而是强调一种系统的整理。面对着新文化阵营的质疑,胡适的解释虽然多有变化,但是其基调则是认为,“故”可以理解为“过去”、“死亡”。他在1928年回答一个人的来信时,甚至把“整理国故”比喻成“打鬼”,就是要让人知道“国故”也就“不过如此”。^①

这个时期的“国学热”,获得广泛的体制性的支持,比如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在1921年创建,1923年4月,东南大学国文系议决设立国学院,并制定了系统整理国学的计划书。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1926年厦门大学国学院成立。

与晚清国粹派的国学观比较,这个时期的国学讨论出现了一些重要的转折。首先,中华民国建立之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已经成为事实。由此,“国学”研究者的思考重心逐渐从国家意识的确立转变为对于什么是现代中国的讨论。即要关注什么样的思想能够成为民族国家体系下中国的立国之本。对此,不同的学者认识尖锐对立。有人认为中国之为中国主要在于历史文化和经典传承。而启蒙派的学者则认为中国的精神不在经典之中,而是存在于民众的生活世界中。北京大学研究院国学门侧重于民间歌谣的收集和习俗的调查,即意在于此。更为关键的是,他们认定科学所代表的普遍意义的公理超越了国家之间的区域局限而成为民族精神的向度,从而解构了传统价值与民族精神之间的血缘性、地域性联系。在这样的改变中,“国”恰好成为公理的对立面。何炳松说:“国学的国字,显然表现出一种狭小的国家主义精神。这不但违反我国先贤所主张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种大同精神,而且亦违反西洋学者所主张的‘知识无国界’那种学术公开的精神。”^②

作为这个时期国学研究的代表人物顾颉刚等人对于历史的态度的转变,有人认为是“革命性”的。“大概在1920年至1930年,中国一群领导性的史学家不约而同地提出新的反省,他们对史料的态度有一个革命性的变化。这些人包括胡适、傅斯年、顾颉刚、李济等。他们的文字分散各处,如果稍加比辑,可以发现一个认识论上的改变。首先,对这一代人而言,传统的权威已经几乎倒塌了,所以六经在他们看来都只是史料了——是供人研究的材料,而不是让人寻求治国平天下大道理之所在。在这个前提下,他们同时也提倡一种历史发展的观点,也就是平等看待每一时代学术思想材料的价值,不再以为只有那最高点才有价值。”^③

傅斯年开始筹建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时候,就是要把历史和语言从传统的学术谱系中“解放”出来,在科学公理面前,地域的差异对于国家认同的意义被看作是一种固步自封,因此,即使连“国故”这个概念也成为他攻击的目标。他认为要建立一

① 胡适:《整理国故与“打鬼”》,《胡适全集》第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47页。

② 何炳松:《论所谓“国学”》,《小说月报》20卷1号。

③ 王泛森:《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载王氏著:《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48页。

种真正的“科学”的态度,必须将“国故”的概念也抛弃。

由此可见,从晚清的国粹派到1920年代以后的国学研究,虽然多样化的立场之间争论激烈,但总的趋势则是循着由以提振民族精神、确立国家意识到强调以科学和民主为核心的新的民族精神的建设的转变。这样的转变的动力来自于国学研究者所面对的问题发生了由寻求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到建设富强的国家、改变国民特质的转变。而1930年代之后面对日本的侵略,民族主义再度兴起。

在随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传统资源长期被贬斥,国学研究也被置于“批判”甚至“破除”的境地,一直到1980年代文化热的时候,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关系才再度被重视,自1990年代中期开始,国学研究再度兴起,并到21世纪初成为热点。

新世纪的国学热,所要面对的则是全球化的深化所带来的国际关系形态的进一步变化。“在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跃进中,一系列新特点界定着国家内部秩序,而新的超国家秩序同那些特点有着明显的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并非‘由内及外’,以内部秩序推演出国际体系,而是‘由外及内’,以超国家秩序推演出国家内部的法律体系。”^①这种由外及内的秩序体系最典型的表现是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在解决国际纷争、维护世界和平、保障国家之间的平等诸方面担负的某些作用,所以国家的重要性相对减弱,区域组织和国际组织取代了某些国家功能。同时,全球化还使国家的经济自主性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在这样的背景下,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些疏离。

看上去有些矛盾的是,全球化也从另一方面强化着民族国家的认同。因为全球化过程所形成的不平等的经济和政治秩序对于弱势国家是一个挑战,中国作为一个有着独特的文化价值体系的新兴的经济体,内在要求对世界秩序的和谐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并试图为重建世界秩序提供有益的价值支撑。这样,建立在鲜明的中国意识基础上,有更强烈的责任意识成为国学研究的主要议题。我们可以看到,夹杂着读经、儒学复兴、文化本土性等复杂议题的国学热,虽然有时体现出激烈的民族主义色彩,但是这样的意识与其说是对中国本位的强调,毋宁说是对于国际间秩序的批判性视野,表达中国想真正成为世界重要成员的渴望。

1978年之后,中国进行着由经济体制改革导引的全方位的社会变革,思想文化也进一步开放,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调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目标的确立,体现出民族文化已然成为解释中国政策的文化背景和呈现中国未来方向的重要基础之一。基于此,国学研究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自信心,乃至国家软实力的建设都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① 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杨建国、范一亭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7页。

二、“国学”与“科学”、“学科”

“国学”虽立足于“国”，但“学”是其载体，无论是国家认同还是民族精神的重构，这些使命都是要通过对传统思想学术的不同呈现方式来体现的。

国学的具体内涵就是中国传统的学术。在中国面对现代性的挑战的时候，中国的知识体系也不可能独善其身。现代化运动打破了古代社会的有机整体结构，代之以目的一合理化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根据马克斯·韦伯的理论，现代化运动是社会理性和世俗化过程，它以理性化发展打破了传统社会基本理性的统一性。对于思想学术而言，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适应生产、分工发展而逐渐形成的专业化学科体系的建立，“多元学科的创立乃基于这样一个信念：由于现实被合理地分成了一些不同的知识群，因此系统化研究便要求研究者掌握专门的技能，并借助于这些技能去集中应对多种多样、各自独立的现实领域”^①。

以科举为典型特征的中国古代教育制度，虽然是一种世俗性的教育方式，但是并非专业性技能教育，所以传统的中国学术体系，在中国进入现代化的进程之后，必然要面对日渐专业化的过程。鸦片战争失败之后，人们对于绵延千年的科举制度的批评主要就是其选拔的人才难以“经世”，不能使中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我们可以发现，虽然晚清改革无论从理念到方法见仁见智，甚至绝然对立，但是对于改变教育制度、采纳西方的学术分科观念却是空前的一致。康有为、张之洞、严复、梁启超、张百熙等均接受西方的学术分科体系，并开始提出各自的分科方案。

1898年，严复发表文章《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指出，传统中国的学校只有做官治事一途，所以难以适应分工日益细密的社会需要，“国愈开化，这分工愈密，学问政治，至大之工，奈何其不分哉！”所以要把治学和治事分开。^②稍后在知识界影响巨大的杜亚泉也说，国家之间的竞争其实是职业（产业）之间的竞争，而专业化则是增强产业竞争力的关键。^③

专业化所要求的知识系统的分化是中国传统的教育和学科体系所不能提供的，这样的认识始终体现在“国学”的发展实践中，晚清的国粹派区分“国学”与“君学”就是试图确认学术的独立性，而他们所预备设立的“国粹学堂”，学制三年，科目包括经学，文字学，伦理学、心性学、哲学、宗教学、政法学、实业学，社会学、史学、典制学，考古学、地舆学、历数学、博物学、文章学，音乐、图画、书法、翻译等，形式上与旧学已经大不相同。虽然所学内容均来自中国传统的学术资源，但显然已经借鉴西方的学科体制进行

① 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刘锋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9页。

② 王栻编：《严复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9页。

③ 杜亚泉：《亚泉杂志序》，《亚泉杂志》第1期，1900年11月。

了新的分类。最早进行国学讲习活动的章太炎,也是新的学科分类的实践者。1906年,章太炎在日本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曾经刊登《国学振兴社广告》,谓国学讲授内容为:“一、诸子学;二、文史学;三、制度学;四、内典学;五、宋明理学;六、中国历史。”这个对于“国学”内容的设置,与传统的经史子集的分类方式有根本的差异,最明显的是没有了传统知识的价值基础“经学”。

另一国学代表人物刘师培也是从社会分工来论证以分科方式整理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必然性:“野蛮之民,所具之能甚简,及世界进化,则所具之能亦日多。惟所具之能甚简,故所业亦必简单;惟其所具之能日多,故所业亦归复杂。如古之商人,不必知书,古之士人,不必习武;今则文明各国,商必知学,士必服兵,而农人亦需入学;非所治之业由简而繁之证乎?今行此法,使人民于所治职业,由简而繁,正与社会进化之公例相合。且古代之学,均分科而治;今则无论何国,人民于未冠之前,均习普通科学。夫普通之科学,既尽人而能知,则普通之职业,亦必尽人而能为。既尽人而能为,则智识愈备,能力日增。”^①

由传统的整合式的、以人文思想为核心的知识体系向现代的分科式的以科学思想为特性的分科方式变化,从价值上,本身就是要推翻传统的宗教性的劝慰,代之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来对应原先为神学和经学垄断的知识领域。说到底,现代学术的产生是因为人们相信可以通过某种可以验证的方式发展出一种系统的世俗的知识,在这样的转变中,中国原有的以经学为核心的知识体系便要经受“理性化”的洗礼。

在经验性的对照之下,传统的体会式的经学思维便显得缺乏可验证的方法的支持。实证化的科学成为建立普遍性原则的基础。在这样的要求之下,传统学术缺乏规则和可验证性的特性就成为一种方法上的“缺陷”。刘师培十分重视“方法”对于学术的意义,他认为传统的学术缺乏纯理论之规则,比如,中国论文法之书,没有上乘之作,他甚至认为中国无一人知国文。

但是,在引入新的方法之后,内在的问题也随之而产生。传统的国学所提供的是关于宇宙、社会和人生的整体性思考,它既包含可验证的理性知识,也包含价值性的信念。当我们开始接受科学公理来取代以前的“天理”的时候,我们需要接受新的学科体系和实证方法。但是新学科则导致中国传统思想的意义系统被分解,而最终难以突显自身的独特性。比如,当中国的传统的经典系统被归入哲学、历史和文学等不同的学科之后,这些西方化的学科方式完全剥离了经典的语境,经典原先所承载意义和价值便难以呈现。这样的矛盾在20世纪20年代激化。有人因忧虑中国价值的解体而拒绝新的学科,而有人则想通过学科的变革而完全否定原有的价值系统。

的确,学科变革的背后是价值的重构。西方文化的出现解构了中国固有的天下国

^① 刘师培:《人类均力说》,钱锺书、朱维铮编:《刘师培辛亥前文选》,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111—112页。